

戲曲研究

第七十二輯

- 「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 「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
- 《邯郸记》评议
- 论汤显祖《邯郸记》的成就及其影响
- 《牡丹亭》的世俗选材与民俗观照

- 论晚明文论话语下的《牡丹亭》批评
- 再论《牡丹亭》的音律问题
- 遂昌县民间昆曲活动情况探析

- 元杂剧中的商贸形象与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 元剧中的寒食风俗及与唐宋诗词相关描写的承续关系
- 汤显祖戏曲与弋阳腔关系辨析
- 「花雅之争」新论



- 变脸神气在移步要换形
- 也谈传统戏曲形态的基本特征

-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的双重人格
- 关于元杂剧的一个语言现象考察

戏曲研究

第七十二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戏曲研究》编辑部 编

福建省艺术研究所 协办
湖北省艺术研究所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曲研究. 第72辑/《戏曲研究》编辑部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39-3251-9

I. 戏... II. 中... III. 戏剧—中国—现代—文集 IV.
I2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6432 号

戏曲研究(72)

著 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戏曲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 向 宏

封面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兵工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97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251-9/J·85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顾 问:

郭汉城 王文章 曲润海 薛若琳

主 编:

王安葵 刘 祯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

王安葵 刘 祯 刘文峰 沈达人

贾志刚 黄在敏 谢雍君 颜长珂

编辑部主任:

谢雍君

执行编辑:

郑志良

目 录

“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

- “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 吴书荫(1)
- 《邯郸记》评议 张燕瑾(12)
- 论汤显祖《邯郸记》的成就及其影响 赵山林(22)
- 《牡丹亭》的世俗选材与民俗观照 (台湾)杨振良(32)
- 论晚明文论话语下的《牡丹亭》批评 孙书磊(44)
- 再论《牡丹亭》的音律问题 刘水云(63)
- 遂昌县民间昆曲活动情况探析 罗兆荣(81)

元明清戏曲研究

- 元杂剧中的商贾形象与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张 静(97)
- 元剧中的寒食风俗及与唐宋诗词相关描写的承续关系 王维娜(118)
- 汤显祖戏曲与弋阳腔关系辨析 程 芸(126)
- “花雅之争”新论 张勇凤(139)
- 以禁戏为切入点

戏曲理论

- 变脸神气在 移步要换形 王绍军(157)
- 对于戏曲表演语汇合理化创新的建议
- 也谈传统戏曲形态的基本特征 戴义德(171)

戏曲文化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的双重人格 厉震林(188)

关于元杂剧的一个语言现象考察 周有斌(203)

——唱词宾白中的“把”字句

戏曲文献

清人王尔纲及其佚剧《杏村醉雨》 纪永贵(211)

清代楚曲剧本概说 (台湾)丘慧莹(218)

地方戏研究

潮剧在南戏中的地位 【日本】田仲一成(232)

“姑娘腔”考辨 孔培培(250)

河北梆子和豫剧音乐比较初探 蒯卫华(267)

楚调“皮黄合奏”成因及其传播 胡汉宁(290)

京剧研究

京剧“样板戏”研究 汪人元(299)

湖北京剧的发展历程与朱世慧的艺术成就 刘章俊(320)

当代学人

厚积薄发 开拓创新 霍建瑜(332)

——黄竹三先生的治学之路

戏曲研究的文化视阈 戴 峰(345)

——郑传寅先生的学术研究

戏曲书评

- 褚伯承《乡音魅力——沪剧研究与欣赏》简评 周锡山(358)

学术动态

- 古剧新韵 付华顺(372)

——中国四平腔学术研讨会述评

- 第三届“海宁杯”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学术研讨会述略 申 文(383)

- 2005 年中国古代戏剧研究论文索引 徐丽蓉 张 蕾 王俊花(391)

编者按:2006年9月22日至2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曲学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浙江省文化厅、遂昌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遂昌县隆重召开,来自韩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全国各地高校、各省研究所等单位的120多名汤显祖研究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对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近70篇。为了使全国各地的戏曲研究人员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本刊在本辑特此设置栏目,刊发会议论文7篇,以飨读者。

“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

◎ 吴书荫

明代茅元仪为其弟茅暎刊所刻的朱墨套印本《牡丹亭》,写了一篇《批点〈牡丹亭记〉序》,曰:“《玉茗堂乐府》,临川汤若士所著也。中有《牡丹亭记》,乃合李仲文、冯孝将儿、睢阳王谈生事而附会之者也。”“乐府”一词自宋代以后,其义比较宽泛,就不局限于指“乐府诗”,词、散曲和剧曲都可以称作“乐府”。既然《玉茗堂乐府》中包含有《牡丹亭记》,它应当是一部汤显祖戏曲的合集。但这个“合刻集”从不见有关书目著录,也不见有存本流传,因此,学者在称引《批点牡丹亭记序》时,忽视了对《玉茗堂乐府》的留意,当然也就谈不

上去探索和研究。

笔者在考察汤氏交游和诗文系年时,从明人吴之鲸(伯霖)的《瑶草园初集》卷一中,发现了久被遗忘而又罕为人知的《玉茗堂乐府总序》,从而更进一步证实,《玉茗堂乐府》的确是汤显祖的戏曲合集。序云:

汤若士先生初为《紫箫记》,后编为《紫钗》,才子之思,文人之笔,娇弄潜移,清风独转。继复为《牡丹亭》,三吴咸称,自《会真传》来,今始□(为)两。最后为“二梦”,而极变穷工,又现一奇矣。齐梁丽曲,首推鲍谢。要以含意未申,芊绵结郁,为传情之至。故河梁送别,揽祛[袂]归萸,总不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二语,自足伤神。至读长卿《长门》,陈思《感甄》,宋玉《讽赋》,令人齿酸气颤,又何绵藐酩酊也?然枣下纂纂,花上盈盈,风雪襟带,一时都尽,又何言哉!若士发小玉之幽悱,抒丽娘之异恫,婉变乍矜,余音半逸。擢紫茎[董]于黄台,射青磷于白昼,哀响外激,按节欲停。当令鹤将霜飞,飙横芭灿,而归之蕉鹿,等知十千大地,俱属劳尘。弃海认沔,湛圆悉碍,觉而知梦,未名真觉也。四编次第以出,意在斯乎?噫!空花泡影,总为情结情随。才转才高则情深,亦惟情深者能忘情,登徒子皆不及情者耳。余友德聚,耽奇嗜古,喜搜异书,帐无蓄伎,而雅慕洛咏,汇若士先后制,合刻之曰《玉茗堂乐府》,成以示余。时余方偃□(卧)朗阁,咏无言之诗,急携《邯郸》,枕游大槐国,命雪儿歌之,栩栩然适也。因作呓语数行弁其首,以偿昔之许序“二梦”而未果者。

这篇“总序”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前人多肯定《紫钗记》、《牡丹亭记》为写情之作,而此序则强调汤显祖所有戏曲作品都是写情的,“空花泡影,总为情结情随。才转才高则情深,亦惟情深者能忘情,登徒子皆不及情者耳”。在“四梦”中,作者尤推崇《邯郸》、《南柯》二记,称其“极变穷工”,这恐怕与序作者当时的处境大有关系。因为屡蹶科场,吴之鲸心境不佳,遂留心方外,耽于

“二梦”，从中寻求其内心的寄托，“时余方偃□（卧）朗阁，咏无言之诗，急携《邯郸》，枕游大槐国，命雪儿歌之，栩栩然适也”。二是，提供了《玉茗堂乐府》所收剧作和编刊者的简略情况，为我们深入探索这个“合刻集”的编刊者、刊刻时间以及与其他几部明人编刻的汤氏戏曲合集的关系，对考察汤显祖戏曲作品在明代的刊刻和传播，都是极为有价值的文献数据。

一 《玉茗堂乐府总序》的作者吴之鲸

吴之鲸字伯霖，汤显祖《玉茗堂尺牍》卷五有《与吴伯霖》书信一通，徐朔方先生已经编入他校笺的《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八中，但对吴伯霖其人未加考订。其实《光绪浙江通志》卷一八七“文苑一”、清丁丙《杭州艺文志》卷五均有他的略传。笔者在《〈汤显祖全集〉笺校补正》中作了补考。^{〔1〕}现根据方志、吴之鲸及友人诗文集集中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其小传为：

伯霖，又字伯裔，号朗士，钱塘人（今浙江杭州）。文才俊爽，笃于义气，工文章，以《骚》、《雅》自命。万历二十九年建成朗阁，成为他读书宴客、参禅礼佛的场所。四方从学者众，其弟子中不乏有考中进士者。但屡蹶场屋，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中举。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撰成《武林梵剡志》十二卷。后谒选浮梁县令，不久病卒。著有《閨阁草》一卷（佚）、《瑶草园初集》十册（存十一卷）、《西湖双忠传》（佚）等。

吴之鲸和黄汝亨两人文名相伯仲，他同《再生缘》杂剧作者吴大山并称为“江皋二俊”。^{〔2〕}在冯梦桢、陈继儒、虞长孺、屠隆、梅鼎祚、潘之恒、沈朝焕诸家的诗文集中，都能发现与吴之鲸酬唱和交往的文字，彼此之间过从较多。他

〔1〕《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见拙文《〈再生缘〉杂剧作者考辨》，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们都是当时江浙、安徽一带的著名文人或士大夫,除了吴大山以外,其余诸家也都是与汤显祖来往较密切的友人。吴伯霖与《玉茗堂乐府》编刊者的父亲吴伯实、叔父吴仲虚的交往,就是通过冯梦桢、汤显祖的介绍,才成为知交,“向余从冯开之、汤义仍两先生获闻新安吴伯实、仲虚两君子,恂恂孝友,多长者行,窃心仪之”。^[1] 汤氏《邯郸记》、《南柯记》写成后,伯霖又允诺为二记作序。可见他和汤显祖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的深厚情谊,过去却不为汤显祖研究者所了解。这篇“总序”不仅是探讨“玉茗堂四梦”最早刊刻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汤显祖交游活动的有力见证。

二 《玉茗堂乐府》的编刊者吴敬家世及刻书

明黄汝亨《寓林集》(天启四年刻本)卷首,在“校文姓氏”中首列“吴敬德聚”。同书卷八有黄氏为吴敬书斋所写的一篇《尊闻堂记》,云:“吴子德聚……父伯实先生、叔仲虚氏。”由此可知《玉茗堂乐府》的编刊者应当是吴敬。

吴敬,徽州府休宁县人(今属安徽)。《康熙休宁县志》卷五“舍选”云:“吴敬字德聚,商山人。加例文华殿中书舍人。”他生长于“素封”之家,其祖父吴洽为大徽商,仅在杭州一带就经营不少产业。父继美(1545-1597)字伯实,世称“伯实先生”,弱冠曾游南雍,由于为人醇谨忠厚,乃父临终前,嘱其掌管家业,“征营(荫按:指惶恐不安)较计,至达旦不昧,分理诸生产作业在武林诸郡者”。^[2] 伯实对吴敬寄予很高的期望,让他跟随在身边,这样才得以从杭州黄汝亨游学,并以家资捐官文华殿中书舍人。因为黄汝亨的关系,吴敬与吴伯霖的交往也非常密切。

吴敬的叔父名继灼(1553-1599),字仲虚,以字行。五次应乡试皆败北。冯梦桢《快雪堂集》卷二十二有《祭吴仲虚文》,这篇祭文是冯梦桢、黄汝亨和

[1] 吴之鲸《瑶草圆初集》卷三《冈陵阁寿待封吴母程太夫人七十序》。

[2] 黄汝亨《寓林集》卷十六《吴伯实先生墓表》。

虞长孺三人合撰,由冯氏执笔。其中有:“呜呼!仲虚多情嗜义,于吾三人足称臭味。”可见仲虚的为人,他们之间称得上莫逆之交。仲虚同汤显祖亦是“文章气谊之知”,他到临川去,都要下榻于汤家。吴仲虚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偏嗜《左》、《史》、两汉、晋魏诸书,及百家言、稗官小说,无不涉及津涯”^{〔1〕}他的书斋名西爽堂,撰有《西爽稿》。正因为他兴趣广泛,涉猎驳杂,“遂不利于有司试”。但他雅好刻书,其西爽堂刊刻过《晋书》一百三十卷,每卷卷末题“吴氏西爽堂校刻”,黄汝亨为作序;还刻过《虞初志》七卷,王穉登序曰:“吾友仲虚吴君,博雅好古。以《虞初》一志,并出唐人之选,乃于游艺之暇,删厥舛讹,授之剞劂。”汤显祖点校《虞初志》,是否用过此本?待考。仲虚卒于万历二十七年,其后人继续以“西爽堂”名刻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除上述两种外,今尚存者还有十种,即《三国志》裴松之注六十五卷,《大唐西域志》十二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明高棅《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明乔时敏辑《王元美先生文选》二十六卷,明天启四年(1624)刻《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六卷,天启五年(1625)西爽堂自编《皇朝历科四书墨卷评述》不分卷,崇祯三年(1630)刻元杨士弘辑、明顾林批点的《唐音》十五卷,明朱一是、吴玠评《樊川集》十七卷,崇祯四年(1631)刻王征《新制诸器图说》一卷等。吴氏在杭郡多处商业活动中,我想也应包括经营售书业,不然为什么大量刊行史书、诗文集、戏曲、墨卷、佛经、日常器用之类的书籍?

吴敬为人也是“醇质而秀文,裘素封不为侈,寄官中翰,非其所好也。恂恂好修,喜读书”。^{〔2〕}他深受其叔父仲虚的影响,对刊印书籍也极有兴趣。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就刻过黄汝亨辑《古奏议》,卷首有黄氏自序和吴之鲸序。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为顾起元刻《说略》三十卷,有顾起元自序。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印乔时敏辑《王元美先生文选》二十六卷(此书也列于

〔1〕《寓林集》卷十八《亡友吴仲虚先生行状》。

〔2〕《寓林集》卷八《尊闻堂记》。

西爽堂刻书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黄汝亨督学江西时,因官署不慎失火,“衙斋长物,俱为煨尽,其他亡论。而生平诗文集累千余篇,付之一炬……何其惨也”!德聚昆季闻讯后,即以“盛币兼金”去慰问。而汝亨再三致谢,退回馈赠,恳求“以收拾遗文为第一义,托在德聚,幸勿置之”。^[1]德聚果然不负重托,与黄氏门人四方搜集遗文,终于在天启四年(1624),与其从弟吴芝(字采于,仲虚次子)等刊印了黄汝亨的《寓林集》三十二卷和《诗集》六卷。

徽州吴氏虽然经商起家,资产雄厚,但历来重视子弟读书,一门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广泛结交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吴敬有这样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背景,特别是其父辈与汤显祖的交往,再加上有刊印书籍的家传和经验,况且他生平又喜好戏曲,为汤显祖编刊《玉茗堂乐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三 “四梦”的刻印和《玉茗堂乐府》的编刊

《玉茗堂乐府总序》称“四梦”次第以出,这里所说的“四梦”,不包含《紫箫记》。《紫箫记》改本《紫钗记》,成书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行世,卷首镌有万历三十年(1602)陈大来所书写的汤显祖《紫钗记题词》,可知它刊于是年,此本书名既标作“重校紫钗记”,说明先前一定刊印过,它应该是“四梦”中刻印最早的一种。《牡丹亭》撰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南柯记》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而《邯郸记》当时正在写作中,直到次年才杀青。故汤氏先将新写的《牡丹亭》和《南柯记》以手抄本赠给友人,他在《答张梦绎》书中谈到此事:“谨以《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梁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2]万历三十年(1602)秋,又将《牡丹亭》赠给黄汝亨,黄氏极为赞赏,即作《复汤若士》信:“政雀鼠喧阗时。

[1] 《寓林集》卷二十八《与吴德聚》。

[2] 徐朔方笺注《汤显祖全集》卷四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得《牡丹亭记》。披之情魂俱绝。三昧游戏,遂而千秋乎?妒杀,妒杀。”这次所赠本究竟是抄本还是刻本?《汤显祖年谱》未作可否。^[1]古人尤重视自己诗文集的刊行,多数是自己出资刻印。万历二十三年(1595),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自编了《玉茗堂选集》,当时未能付梓。二十六年(1598),他弃官归临川后,家境相当窘迫,当然更无财力出书,直至三十四年(1606),才由金陵文秉堂刊印。此集仅有十五卷,只收韵文赋和诗,未收戏曲,原来打算收录的各类散文和书信,在上版开雕时也统统被删去。^[2]因此,《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年就有刻本行世,黄汝亨所得到的很可能还是抄本。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钱希言到南昌为退休首辅张位祝寿,八月既望,往临川访县令袁世振。希言字简栖,系钱谦益的从高祖叔父,其人甚高傲,“笔下目中俱无旁人,而独亟见海若先生”。^[3]因此,他至临川后,特借住汤显祖的东阁旧居,先后盘桓近三个月,汤氏和帅家兄弟予以热情接待,他们“日逐舞裾歌扇”,并观看了“二梦”传奇的演出,但没有提到赠送《牡丹亭》诸传奇之事(《松枢十九山》之《二箫篇》)。^[4]如果汤氏的文集或“四梦”善本已经印行,肯定会送给钱希言的,而希言也就不会向汤显祖表示,愿意帮助他选书稿以流传。直至次年,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汝亨由奉贤县令调北京礼部主事任,先回杭州探亲,汤显祖即致书钱简栖:“贞父内征过家,兄需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也。”^[5]另外,黄汝亨也将

[1]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卷三《汤显祖年谱》第40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 见拙文《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补考》,载《国学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寓林集》卷二十七《与汤海若》。

[4] 转引自《晚明曲家年谱》卷三《汤显祖年谱》,第416~417页。

[5] 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卷四十七《与钱简栖书》。

《牡丹亭记》赠与沈德符，沈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中提到此事：“顷黄贞甫汝亨已由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万历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黄汝亨离开奉贤任所，六月十七日先回到杭州。由此可知“四梦”刊刻应在三十二年底至三十三年五月之前，而且有了善本。万历三十二年，汤显祖次子大奢在南都金陵与张世伟（异度）相遇，大奢问曰：“家君大慕兄，有书寄兄曾达否？”（按：此书即《与张异度》，收入《汤显祖全集》卷四十六）张氏未收到此信，故答曰：“实未见寄。”大奢告诉他“已刻集中”。^{〔1〕}从两人对话中透露一个信息，此时大奢正在南京为其父刊印《临川汤海若玉茗堂文集》（即金陵文秉堂刊印的《玉茗堂选集》）。万历时金陵书坊林立，以刊印戏曲而著名的唐氏书坊主人，大多来自江西金溪。金溪与临川毗邻，明代同属于抚州，万历间“四梦”的刊本多数由江西老乡所刻印。在刊印文集时，可能又插印了汤氏的传奇剧本，致使资金受到影响，延迟了文秉堂刊印本《玉茗堂选集》的竣工，直至两年后它才刊印出来，而且将文集中准备收录的散文和书信删去。汤氏所说的“四梦”，是对自己剧作的“总称”，还是指四本传奇的“合刻本”？笔者认为应该是指前者，其原因有三：一是，如果不是单本刊行而是“合刻”，黄汝亨就不会只赠给沈德符一本《牡丹亭记》，而应当赠以全套“四梦”，不然有失礼貌和人之情。二是，如果是“合刻本”，卷首应当有汤显祖自撰或请友人撰写的总序，可是此序既不载于各种刊本的汤氏文集中，也不见于其友人的任何记载，足见根本就不存在汤氏自刊“合刻本”事。三是，吴敬编印《玉茗堂乐府》，是“汇若士先后制，合而刻之”。假如“四梦”已有新刻合刊本问世，作为汤氏挚友的晚辈就不必再迫不及待地“合而刻之”。

吕天成《曲品序》云：“予舞象时即嗜曲，弱冠好填词。每入市，见新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他广泛收罗当时刊行的各种曲本，早在万历三十年，就开

〔1〕 明崇祯刊本《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十五《汤常博义仍先生》。

始撰《曲品》，后几经修订，终于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完成此书。《曲品》中著录了汤显祖所创作的五传奇，说明这一年之前，《紫箫记》和“玉茗堂四梦”都以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今皆有万历间刻本传世者，《紫箫记》创作于万历五至七年之间，有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唐绣谷世德堂刊本；《紫钗记》则有万历三十年（1602）继志斋本行世；因为《牡丹亭》最受读者欢迎，所以当时刊本较多，有万历间刻本，万历间金陵唐锦池文林阁、槐塘九我堂和七峰草堂等刻本，以及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南柯记》仅有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刻本；《邯郸记》也只见万历间一种刻本。吴敬所编刊的《玉茗堂乐府》既然是“汇若士先后制，合而刻之”，很可能是黄汝亨带到杭州的汤氏戏曲“善本”，或者先汇集当时流传的诸坊刻本，再用“四梦”善本进行校订。万历中期正是戏曲书籍刻印的繁盛时期，吴敬将“四梦”单行本彙而合刻，不仅方便了读者，而且也是对汤显祖的一种敬爱。然而也可以藉此盈利，作为一个书商，他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那么《玉茗堂乐府》究竟编刊于何时呢？如果能确定《玉茗堂乐府总序》撰写的大致时间，这个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总序”的结尾说：“因作吃语数行弁其首，以偿昔之许序‘二梦’而未果者。”所谓“二梦”，是指《南柯记》和《邯郸记》，它们刊印前，汤显祖曾请吴之鲸写序，吴氏也允诺，直至万历三十二、三年间，“二梦”都已经有了刻本，他尚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当吴敬诸他为《玉茗堂乐府》作序，吴之鲸总觉有一种负疚感。“总序”中既云“昔之”，说明他对汤氏的允诺，不是近一两年的事，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因此《玉茗堂乐府总序》大概写于万历三十五、六年间。如果此种推论比较符合情理，那么吴敬所编刊的《玉茗堂乐府》也应成书于此时。

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也称“临川四梦”）的明代合刻本，万历年间有臧懋循改订本《玉茗堂四梦》，但已失去汤氏原作的风貌，先可不计算在内，今尚

有万历末柳浪馆评点本“临川四梦”^{〔1〕}、天启四年张弘毅着坛刻本《玉茗堂四种曲》(但这四种曲并未刻完,只刊出《牡丹亭》)、明崇祯间所刻沈际飞独深居点定本《玉茗堂四种曲》、明末刊本《汤义仍先生四种曲》等传世。可以看出以上几种合刻本的刊刻时间,都在吴敬《玉茗堂乐府》之后,因此《玉茗堂乐府》应当是汤显祖戏曲集的最早合刻本。上述四种合刻集也都不收《紫箫记》,它们的刊印显然要受到《玉茗堂乐府》的影响。

四 《玉茗堂乐府》的遗存

茅暎刊所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其插图有“庚申中秋写”的题字,“庚申”为明泰昌元年(1620),此本当刻于这一年。茅元仪既然在《批点〈牡丹亭〉序》中,提到了《玉茗堂乐府》,说明直到泰昌间这个“合刻集”仍然在流行。后来虽然失传而且不为大家所知,但我们仍能在现存的戏曲选集和汤显祖戏曲的有关刊本中探索到它的遗存。如:

1. 明止云居士编、白云山人校本《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卷七,收有《牡丹亭》中《冥判》、《还魂》两折。这个戏曲选集是吴氏西爽堂在明代天启四年(1626)所刊刻。这是吴氏家刻的选本,所选《牡丹亭》的折子戏,当然会出自吴敬所编刊的《玉茗堂乐府》。

2. 明泰昌间茅暎朱墨套印本《牡丹亭》,茅元仪在序中称“家季校其原本,评而播之”。此剧也应以《玉茗堂乐府》为底本,可是与今存万历间刻本、万历四十五年刊石林居士序本(此两本最接近原刊)比较,刊印者作了不少改动,

〔1〕 荫按:柳浪馆镌刻“四梦”最为罕见,郑振铎曾有《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两种,而《紫钗》、《邯郸》二记则为大兴王孝慈所藏,“海内未闻第三人有之也”(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卷下《西谛所藏善本戏曲题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此“四梦”也流散,《牡丹亭还魂记》则藏入台北中央图书馆,《邯郸记》为神田喜一郎所得,今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余下两种归国家图书馆善本部。